

不可忘却的纪念

——基于新史料之上的萧友梅现代思想解读

文◎徐金阳

引 论

萧友梅先生(1884—1940)是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在中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及理论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关萧友梅的研究,迄今为止已逾甲子。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涉及萧友梅的创作作品及音乐教育思想和行为,目的是阐发他的现代音乐教育思想及行为的意义,以及由此引申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如在著作类的《萧友梅作品集》、《萧友梅音乐文集》、《萧友梅传》、《萧友梅纪念文集》、《萧友梅全集》、《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等作品中,以及在文论类的自1979年廖辅叔先生《纪念萧友梅先生》一文始,直至当今的大量研究文论中,基本上都只涉及上述内容。学者张鹏珍在《萧友梅研究述评》一文中亦得出有关萧友梅的研究,主要只涉及作品、音乐教育及行为、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功过是非论争等四个方面的结论。^①面对这些研究文献,笔者曾产生过一些想法:音乐教育思想确实是萧友梅最重要的现代思想,但作为一个生活在有着巨大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时代,与孙中山、蔡元培、赵元任等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有着长期相互影响,曾经

亲身参加过民主革命的爱国知识分子,难道毕其一生只关注过音乐教育吗?他有没有关注过其他事情?并据此形成过一些较为重要的现代思想?

黄旭东、汪朴两位先生曾说:“萧友梅所取得的业绩与贡献,并非是他单独一个人孤军奋斗所得来,而是与同时代的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们联手合作、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萧友梅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偶然的主观的事象,更不是他心血来潮的盲动言行,而是在先生近二十年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生观、历史观、哲学观、美学观、教育观、音乐观的统摄下,自觉地顺应20世纪的时代潮流,针对现代社会音乐文化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客观需要而提出的一系列进步的思想、主张、措施和付诸实施的种种变革行为。”^②如果说这种密切关注萧友梅音乐思想行为与其生存环境中同类思想行为及同行学者之间

^① 张鹏珍《萧友梅研究述评》,《大众文艺》2013年第10期。

^② 黄旭东、汪朴《依托前辈肩膀运笔,期望有心学人修订——〈萧友梅编年记事稿〉编者寄语》,《人民音乐》2007年第12期。

的联系的研究方法,是一条普遍联系的科学的研究思路,那么,顺应这一思路,笔者上述思考就应该有个合理的解答。然而,有关萧友梅的文献资料,散失得实在太多^③,而现已建成的关于萧友梅的资料数据系统,其本身又欠完善^④。所以,在现有史料的前提下,笔者的想法似乎很难证实。

带着上述思考,笔者与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彭飞老师一起,通过长时间的搜寻,从上海图书馆馆藏民国报刊杂志的电子资料文库中,陆续发现了一些埋没多年的、有关萧友梅音乐教育之外的珍贵的新史料。它们分别是:萧友梅创作歌曲《上海的植树式》、发表于《劝业丛报》上的两则译文,一份于“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上呈交的提案及一封写给“京师学务局”的信函。针对这些史料,笔者查阅过《萧友梅全集》等多部文献,均未见有披露。为慎重起见,笔者还曾就相关史料电话咨询过几位近现代音乐史专家,如向延生老师、陈聆群老师等,他们亦告诉笔者从未见过这些史料。所以,这些是尘封已久的“新”史料,可以确定无疑。研读这些史料,笔者曾经的想法终于有了基本的证实:从史料看,萧友梅确实还有一些其他值得纪念的现代思想,如“绿化环保”、“开发实业”及“普及国民教育”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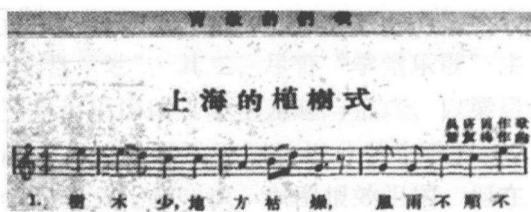
笔者写作此文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把有关萧友梅先生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公之于众,以享方家学者;第二,通过对新史料的解读,再现更为全面的萧友梅;第三,值萧友梅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对先生表达深切的怀念。

一、歌曲《上海的植树式》

笔者发现的歌曲《上海的植树式》,发表于1935年出版的《我们的教育·徐汇师

范校刊》第9卷第1期第32页(见图1)^⑤:

图1



(一)关于作品

《上海的植树式》的词作者吴研因先生(1886—1975)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诗人,早期研究小学语文教材教法的重要人物,江苏江阴人。1949年之前,吴先生先后担任江阴市立九校单级部主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南京大学院初等教育司司长及教育部驻菲律宾华侨教育专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司长、中学教育司司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教学法组组长等职。^⑥1927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吴研因应上海教育局局长韦懿之邀,至上海任上海教育局主任秘书兼督学。^⑦正是这一任职,使得吴研因有条件有机会为上海的植树仪式创作主题歌词。至于吴研因作词的时间,笔者认为应该在1928年二三月之间,因为,1928年3月2日上海《申报》的《市政府筹备植树节近讯》中已刊载了歌词^⑧,而吴

③ 萧淑娴《萧友梅业绩之一二》,《音乐研究》1984年第2期。

④ 卢海燕《著名音乐家萧友梅的著述、传记、评传等文献资讯简介》,《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年第3期。

⑤ 《我们的教育·徐汇师范校刊》1935年第9卷第1期。

⑥ 雨辰等《影响中国20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吴研因》,《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1期封底。

⑦ 苏金如《中国现代小学语文教育的探索者——吴研因》,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⑧ 《申报》第19740号,第14页,1928年3月2日。

研因应该没有必要过早就写作歌词。

萧友梅作曲的时间,笔者认为可以大致定在1928年3月12日之前的二三月份。因为第一,歌曲运用的场合是1928年3月12日的植树节,所以创作时间必定在此之前;第二,萧友梅的歌曲创作惯例都是先有词后作曲,所以创作时间必定在作词之后。当然,笔者认为也有必要在此论及一下萧友梅为植树式谱写歌曲的可能性问题,答案是肯定的:1927年9月1日,《申报》刊载了上海大同乐会欢迎萧友梅的报道,称“著名音乐家萧友梅,于数日前来沪”^⑨。根据报道,既然萧友梅至迟已于1927年8月底到达上海,那他当然就具备为1928年上海植树式谱写歌曲的机会和条件了。

《上海的植树式》歌词共两段,新诗歌体,符合吴研因的语言思想。第一段写上海环境糟糕,从而引起一种植树的急迫感,号召大家植树改造环境;第二段展望绿化

后的上海美景,给人以深深地期盼。词虽简朴,但寓意深刻,表达了一种现代环保主义思想。词作者还特别注意了用字:歌词最终定版的第一段最后一句“大家来改造”中的“来”字,在《申报》初刊中用的是“望”字。“望”,有观望、指望的意思,自己不见得行动,而“来”,则体现了主人翁精神,且有号召性。改“望”为“来”,使作品的环保意识体现得更加鲜明。

《上海的植树式》的旋律相对简单,艺术性与萧友梅大部分歌曲作品相仿。比较有特点的是,萧友梅在创作时使用了较多的弱起、大附点及休止节奏。全曲弱起共四次,大附点六次,八分休止两次,四分休止五次。这种节奏上的构思,使旋律具有紧迫感和号召力,与歌词相结合,切合了植树仪式的氛围。所以,尽管整首作品短小朴实,但演唱起来,应该具有较好的鼓舞民众的效果。以下是笔者的重新打谱^⑩:

上海的植树式

吴研因作词
萧友梅作曲

1. 树 木 少, 地 方 枯 燥, 风 雨 不 顺 不
2. 人 行 道, 空 地 学 校, 载 种 许 多 树

调, 糟! 我 们 这 大 上
苗, 瞧! 将 来 的 大 上

海, 灰 包 煤 裹, 生 气 萧 条, 改
海, 千 树 万 树, 叶 茂 花 娇, 真

造, 大 家 来 改 造!
好, 风 景 真 正 好!

⑨ 《申报》1927年9月1日,《申报》影印本,第238册第2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

⑩ 在打谱时,笔者据现行通用记谱格式,对原谱记谱法稍有修改。

(二) 关于作品的使用场域

中国的植树造林,最早由孙中山先生倡导。1893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急农兴学,讲求树蓄”的强国主张。1915年他又提议以每年清明为植树节。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进一步提出大规模造林,以防水、旱两灾的思想。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植树造林、环保兴国”的思想被国民政府继承下来:1928年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为植树节;1929年,南京政府正式颁布《总理逝世纪念植树式各省植树暂行条例》,对各省植树活动时间、参与人员、经费、意义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阐释。^⑩至此,民国植树节的意义,由原来孙中山单纯的强国兴邦,又追加了继承总统遗志及宣扬总统精神等政治文化内涵。这从1928年及其后植树仪式所形成的严格的十一项规程可以看出,分别是:1.奏乐;2.全体起立;3.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致礼;4.主席躬读总理遗嘱;5.静默三分钟;6.主席报告会议宗旨;7.演说;8.唱植树歌;9.呼口号;10.摄影;11.散会。^⑪

从一份有关1916至1949年期间上海市植树仪式一览表中可以看到,自北洋政府1915年采纳孙中山植树节提议至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除1925、1927、1938、1939、1940及1941年等因军阀混战及日寇入侵而未举行植树仪式外,其他年份都坚持了植树仪式。^⑫可见,以植树式来表达对孙中山先生的怀念及对其强国思想的继承,至少在上海已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1928年3月12日上海植树式,有着特别的意义:第一,蒋介石于1927年4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的植树式是南京政府的第一个植树式;第二,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1928年的

植树式也是上海特别市的第一次植树式;第三,1928年3月1日,南京政府规定孙中山先生忌日为法定植树节日期,故1928年的植树式是第一个执行这一规定的植树式;第四,1928年植树式在孙中山先生忌日举行,所以是第一个明确把植树节与继承总理遗志相连系起来的植树节。因此,1928年的植树式受到政府及民众的特别重视:早在3月2日,《申报》即刊载了植树节筹备快讯;《申报》、《新报》都发行了植树节特刊;市政府拟定了“树林是大地的文章自然的艺术”等各种标语;市长张定璠率市政府及中央直属在沪机关官员、市立38所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等两千余人,参加植树仪式以及大中华影戏公司现场拍摄植树式纪录片等。^⑬

《上海的植树式》正是在1928年3月12日这样一个有着特别意义的植树仪式场合中被使用的,它本身也是这一使用场域的重要构建者,集中体现了“环保兴国、总理遗志”这一主题思想。

(三) 从歌曲创作行为看萧友梅的现代思想

通过以上作品使用场域的分析可以肯定,萧友梅创作《上海的植树式》,绝不是出于普通的应景目的,而是为了表达继承孙中山先生“环保兴国”思想的愿望。所以,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环保兴国”思想,已经从环保上升到兴国的高度,而萧友梅先生可能还未达到这一境界的话,那

⑩ 胡波《孙中山与植树节》,《中山日报》2011年3月12日A6版。

⑪ 同注⑩。

⑫ 程绪珂、王寿等《上海园林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⑬ 同注⑩。

么,以创作行为来表达对这一思想继承的萧友梅,说他具有现代“绿化环保”的思想,则并不为过。对此,我们还可以提出更多的理由:

第一,萧友梅与孙中山有过长期交往,感情深厚,孙中山的精神思想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萧友梅,从而转化为萧友梅的思想。早在1892年,孙中山在澳门就与萧友梅有过交往;1905年,留学日本的萧友梅又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1906年,孙中山为逃避日本及清政府的缉捕,藏匿在萧友梅住处一个月之久;1912年元旦,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召萧友梅为总统府秘书员;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萧友梅即作《总理奉安哀辞》以示哀悼;等等^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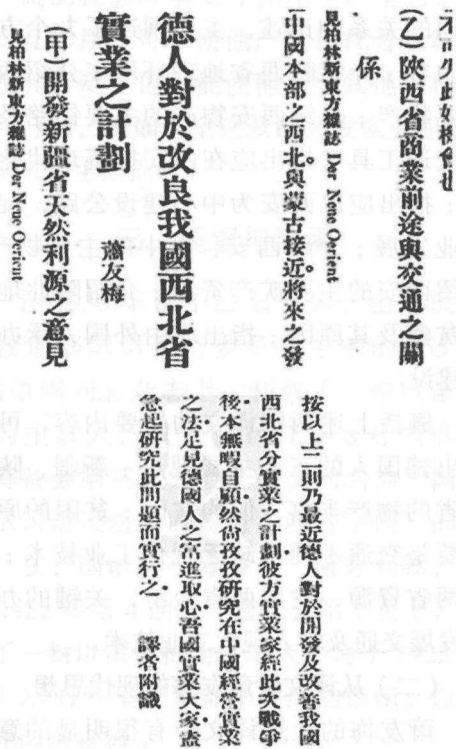
第二,萧友梅有关植树节的歌曲,目前至少有三首:第一首收录于萧友梅1922年10月出版的《今乐初集》;第二首收录于萧友梅1924年10月出版的《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第二册^⑯;第三首就是本文中的《上海的植树式》。一位作曲家如果只创作一首某一题材的作品,似乎不能肯定他已形成了这一题材所反映的某种思想。但如果创作了几首同一题材的作品,那就应该可以肯定他已形成了这一题材所反映的某种思想。所以说,萧友梅之所以创作了几首植树节题材的歌曲,可能正是因为他在孙中山的“环保兴国”思想及其倡导的同类运动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现代“绿化环保”思想的结果。

二、译 文

在1921年第1卷第3期的《劝业丛报》上^⑰,刊载有萧友梅一篇题为《德人对于改良我国西北省实业之计划》的译文。该文由两则译文及译者附识三部分构成:第一

则小标题为“开发新疆省天然利源之意见”;第二则小标题为“陕西省商业前途与交通之关系”;最后是作为按语的“译者附识”。以下是译文(共6页)的部分截图:

图2—4



(一) 关于译文内容^⑱

第一则译文是德国人开发新疆的意见,主要阐述了六个方面的内容:描述新疆地理环境及经济落后的情况;指出新疆落后归因于交通落后;指出开发新疆天然

^⑮ 向延生《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宗师——音乐教育家萧友梅》,《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8、89、109页。

^⑯ 陈聆群,齐毓怡等《萧友梅全集》第二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462页。

^⑰ 该报由北京特派对外实业专使总公所创办于1920年7月,1922年停刊。主编叶公绰。

^⑱ 萧友梅《德人对于改良我国西北省实业之计划》,《劝业丛报》,北京特派对外实业专使总公所,1921年第1卷第3期,第104—107页。

资源的先决条件是交通建设；指出交通建设以公路为宜；指出应以专门人员开发新疆的煤、油等矿业；指出应开发新疆的畜牧业。

第二则译文是德国人关于陕西商业与交通的关系的论述，主要阐述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介绍陕西省地理环境；介绍西安主要物产；介绍西安物产的主要销路及传统交通工具；指出应在西安投资现代化工业；指出应以西安为中心建设公路，促进商业发展；介绍西安、汉中的主要物产；介绍西安的主要矿产资源；介绍陕北地区的贫瘠及其原因；指出应由外国人承办公路建设。

概括上述两则译文的主要内容，可以得出德国人的三个主要观点：新疆、陕西两省的物产丰富，但均贫困；贫困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及缺乏现代工业技术；开发两省资源，发展两省经济，关键的办法是发展交通及输入现代工业技术。

（二）从译文看萧友梅的现代思想

萧友梅的上述译文带有很明显的意向性，从文本功能类型来看实际上是一篇指示文本。这样说基于两个理由：第一是发表的刊物叫《劝业丛报》，所谓“劝”就是“意欲某人做或不做某事”。萧友梅在此刊发表的尽管是译文，但还是为了劝导国民开发西北，谋求实业。第二是萧友梅的按语，体现了更为明确的目的，现摘录如下：

按以上两则乃最近德人对于开发及改善我国西北省份实业计划。彼方经此次战争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本无暇自顾，然尚致研究在中国经营实业之法，足见德国人之富进取心，吾国实业大家，盍急起研究此问题而实行之。

按语，原本就是编、校，或译者主观

意见的表达。萧友梅的按语，尽管简洁，但通过对德国人“富进取心”的评论，反衬国人应研究发展事业，尤其其中“急起”一词，表达了急迫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可见，此译文有鲜明的动机：萧友梅意欲通过译文来劝导中国实业大家，学习德国人，急起研究西北开发问题，并尽力实行。透过这一动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萧友梅正是通过译文来表达自己开发西北，发展实业的主张。

那么，我们可以把译文看成是萧友梅的主观思想，从萧友梅的角度再次概括译文及按语的综合内容：西北两省有着丰富的物产资源，应该加以开发利用；开发西北的重点是交通建设和引进现代西方工业技术；国人应该学习德国人的进取心，急起开发西北。正是以上三点，体现了萧友梅先生“实业开发”的现代思想。

（三）萧友梅现代实业开发思想的来源

首先，萧友梅实业开发的现代思想来源于近代“西北开发”的大背景。

民国之前，提出西北开发思想的主要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及左宗棠等，其中犹以左宗棠为身体力行者。左宗棠在经略陕西、甘肃、新疆诸省十四年间，先后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西北开发问题进行了实践。^⑨至民国时期，在新疆的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面前，政府和民众又掀起了一场西北开发热潮。这一时期，对西北开发做过较多论述和实践的人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张人鉴、曾济宽及徐旭等，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孙中山。1919年，孙中山在他的《实业计划》中，提出了诸如

^⑨ 彭大成《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举措与深远影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建设铁路交通、引进现代工业技术以发展工农林畜牧等支柱产业、移民垦荒等各种措施,对西北开发问题作了整体战略部署。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成为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思想总纲,对其他人的思想及西北开发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②③}

上述这一社会性思想行动,正是萧友梅实业开发思想的产生背景。作为一个关心时政的爱国志士,在这一国家性方略的影响下,形成初步的相应思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萧友梅实业开发的现代思想应该与孙中山有直接关系。萧友梅上述译作文章,大致在1920年7月至1921年9月之间。^{②④}这一时间离孙中山1919年的《实业计划》提出时间接近。也就是说,萧友梅是在孙中山西北开发计划正处“热议”之时翻译此文的。联系之前讨论过的二人关系,我们认定萧友梅实业开发的思想受到孙中山的影响,是完全合理的。

当然,能影响到萧友梅实业强国思想的还可能有叶公绰(1881—1968)。叶公绰是广东番禺人,曾留学日本。1920年,叶公绰受命为北京对外特派劝业专使,《劝业丛报》正是他此时创办。叶公绰任专使时期最主要的业绩是开发东北实业,是东北诸省铁路、水力、电力、矿业等建设的最早计划和实践者。叶公绰、萧友梅二人同乡,又有共同留日及同处北京的经历,之间有较多的交往及相互影响是非常可能的。萧友梅作为一个音乐教育家,却在叶公绰创办的有关实业建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以上三点,主要是对萧友梅“实业开发”现代思想来源的讨论。换个角度,这些讨论也可以作为说明一个主要致力于音乐教育事业的音乐教育家,何以会形成实

业开发思想,以致著文号召开发西北的理由。如前文所引黄旭东、汪朴两位先生的观点,萧友梅先生的思想行为,绝非孤立于社会环境之外、横空出世而来,而是在与广阔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中产生的。这种交互作用,可以使他产生现代音乐教育思想和行动,也可能使他产生其他现代思想和行动,比如这里论及的开发实业思想,差别只在主次而已。

三、提案与信函

在1936年8月22日刊发、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主编的255期《国语周刊》杂志上,刊载了一份以萧友梅为主议人、拟定于1921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上提交的名为“国语文献馆请设法集股铸造铜注音字模”的提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所办刊物,即于1922年第4期的《通讯》第1页上,刊载了一封以萧友梅为主笔人、写于1922年2月25日并呈交京师学务局的信函。以下是此两则材料: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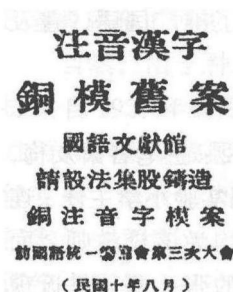


图6



^{②③} 沈社荣《孙中山开发西北思想之影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④} 所以作如此推断,原因有三:《劝业丛报》创办于1920年7月;该刊是季刊,1921年第3期大致是9月;应该是该刊约稿,或者萧主动投稿的情况下翻译此文的。

（一）关于提案

发起提案的共四人，其中提议人为萧友梅和赵元任，连署人为沈彭年和陆基，萧友梅的名字处于首位，所以他应该是主议人。赵元任（1892—1982）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作曲家；沈彭年（1877—1929），江苏青浦（今上海辖区）人，政治家、作曲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金事、社会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21年6月30日曾与萧友梅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乐友社”；陆基，语言学家，1928年国民政府“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

提案的内容主要牵涉五个方面：说明国语推广对于普及国民教育意义重大；指出为语体文（白话文）注音是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的关键；指出为文字注音有很多实施的困难；指出解决的办法是另铸一副注音铜模并加以推广；指出铸造铜模有国语统一筹备会筹款铸造、教育部授权商人承办、教育部与印刷局合资承办等三种方案。

从提案内容可以看出，提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铸造注音铜模，从而解决语体文注音的问题，最终是为了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

（二）关于信函

信函的撰写者共三人：主笔者萧友梅，当时任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实验小学主任；连署者苏耀祖及赵镛，也均为该校教师。而将此函转《通讯》刊发的张一麐，是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早期国语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5年任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去职，1917年任“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副会长，1919年又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专门主持国语统一工作，对推行注音符号尤其重视^②。

信函的内容主要牵涉五个方面：指出

国民学校所用算术课本中的应用题，因生字难认而影响到儿童学习算数技能；指出采用“国音字母单行体”^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撰信人所在实验小学一年多的实践说明采用国音字母的好处；指出撰信人正着手在实验小学编写国音字母单行体形式的教材，并将很快出版；表达了希望国语统一筹备会推广实验小学实践成果的愿望。

比较信函与提案，我们发现信函的核心内容与提案一样，也是为了通过给汉字注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的目的。

（三）从提案及信函看萧友梅的现代思想

首先，萧友梅在提案及信函中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即通过给汉字注音的手段，达到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的目的。同时我们看到，萧友梅藉以表达这一意愿的文件都非常正式，呈交对象也非常严肃：提案的呈交对象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信函则是京师学务局。向这么严肃的对象呈报提案和信函，其内容必定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萧友梅已形成了一定的普及国民教育的现代思想。

其次，从上述两则材料中所牵涉到的人物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材料所涉及的赵元任、陆基、沈彭年、苏耀祖、赵镛等六位人物中，除赵镛笔者未查到相关资料外，其他五人均为当时推广国语的重要人物。如赵元任、陆基都是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张一麐则为会长；苏耀祖虽不

^② 郭家玉《论辛亥革命前后的张一麐》，扬州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

^③ 国音指中国语言的法定标准音，国音字母指拼读时的记音符号，单行体指只有注音字母没有文字的形式。

是筹备会委员，但也是国语筹备会会刊《国语周刊》的编委；沈彭年身为教育部高官，在推广国语上举足轻重。萧友梅与这样一群以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为己任的学者共同起草提案及信函，又与苏耀祖、赵镛两位在附设小学躬行实践，编著教材，如此的表现，说他具有普及国民教育的现代思想，是完全合理的。

再次，在《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中辑录有萧友梅任职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实验小学时期的前后两篇演讲稿，稿中也都论及到推广国语的相关问题。尤其在上一篇演讲稿中，萧友梅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增加中国文字字音、统一国语及在小学推广注音字母等多种主张。^②把这些新旧史料结合起来共同解读，足证萧友梅先生不但具有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的现代思想，而且还比较明确。

（四）萧友梅对普及国民教育的贡献

五四前后，推广国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运动，是普及国民教育的基础，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但被时代赋予文化意义，也被赋予兴邦强国的政治意义。萧友梅尽管未把主要和持久的精力放在这一领域，但由于他独到和前瞻的目光，却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首先，萧友梅最早针对推进注音汉字过程中的“工具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这一方案是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思想来源。

在当时的条件下，想要推广国语、普及国民教育，关键要解决国音拼读问题。而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国民国音拼读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报纸、杂志、读物及课本等出版物中使用注音符号，使广大民众能最便捷地接触到这些注音文字。如果这样，民众在接触各类出版物时就能对汉字进行正确的识、读、记，从而快速学

会国语。然而，要在出版物中广泛使用注音符号并不容易：原有印刷字模没有注音，临时加印注音会给排版、校对等印刷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而且，临时加印注音要占据版面空间，会导致出版物版幅增加。总之，在使用原有字模的情况下，同样的出版物，加注音比不加要多费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提高后，出版物如果不涨价，出版商赚不了钱；涨价，普通民众又买不起。这一矛盾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出版物的原状。事实正是如此，在没有铸成带注音的汉字模铜以取代原有字模之前，尽管使用注音符号的要求早在1913年就有了决议，但长期不见成效，出版商、印刷厂照旧我行我素，出版物照旧只有汉字。^③

萧友梅看到了问题的根本，他的提案是最早针对推进注音汉字过程中“工具矛盾”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铸造一套注音、汉字一体的铜字模，印刷局就可以以之为模，铸造音、字一体的铅字。铜模只要设计合理，之前所说的排版、校对及版幅等问题就都能解决。由此，推广注音汉字，普及国语及国民教育就有了可能。

当然，由于种种社会原因，萧友梅的提案自1921年8月提出，直至1934年11月语言学家黎锦熙再次提出之前，始终未能实现。但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萧友梅的提案失去了意义。事实上萧友梅等人向国语统一筹备会呈交提案时，黎锦熙正任筹备会委员。可以肯定地说，正是萧友梅主

^② 陈聆群、齐毓性等《萧友梅全集》第一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156页。

^③ 于锦恩《论印刷技术对语言规划实施的制约——以民国时期注音国字的铸造为例》，《华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议的提案,为黎锦熙的再次提议及筹备会最终采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34年11月,黎锦熙以《汉字注音铜模,应由国家铸造案》一案,再次投递至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39次常委会,获准通过。1935年3月5日,政府行政院第202次行政会议又通过了经由教育部转呈的上述提案。至此,早在十多年前萧友梅就提出的设想,终于在黎锦熙的再次努力下得以实现。^{②⑥}

其次,萧友梅是较早躬行注音字母教育改革实践并力图向广大教育界加以推广的人士之一。

在任职北京高等师范附设实验小学期间,萧友梅就与苏耀祖、赵镛等教师共同进行了注音字母的教育改革实践。从上述信函中可以看出,至1922年2月,萧友梅等人已经在教学中使用注音字母一年有余,而且效果良好。甚至,萧友梅等人还着手编著了相关教材,并准备出版。萧友梅不但在推行注音字母上走在前面,躬行实践,而且努力想把实践成果推向广大教育界。萧友梅与苏耀祖、赵镛给京师学务局写信,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可以肯定,萧友梅推广国语、普及教育的思想及行动,一定曾对广大教育界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结 语

综观上述三类五则新史料,笔者认为,我们有理由说萧友梅先生一生除现代音乐教育思想外,尚有“绿化环保”、“实业开发”及“普及国民教育”等其他各种现代思想,而且也有这种思想指导之下的实践行动,并对当时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尽管由于萧友梅先生毕生以音乐教育为要务,致使他无暇在其他方面贡献更多,但我们还是应该牢记他的这些贡献,以帮助我们对

他作出更为全面和公正的评价。

历史之于萧友梅先生,到底还是公平的:新中国关于先生的研究,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似乎曾经一直笼罩在所谓“学院派”的阴影之中。然而,2006年黄旭东先生披露了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发现的关于萧友梅在抗战爆发之初所提出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如何办学的方略,即《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这一文件^{②⑦},自此终结了纠缠于“救亡派”与“学院派”之间的有关萧友梅先生的一桩历史公案,为他彻底摘掉了所谓“学院派”的帽子。今天,笔者文中新史料的面世及解读,又把对萧友梅先生思想行为、业绩功勋的认识,从以往单一的音乐教育领域扩展到绿化环保、实业开发及普及国民教育领域。可以说,这是我们在全面认识和评价萧友梅先生这一问题上的又一次发展。笔者相信,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萧友梅先生的思想及功绩,可能还会更加丰富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由此也会对萧友梅先生产生更加全面的认识。

作者单位:湛江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②⑥} 同注^{②⑤}。

^{②⑦} 黄旭东《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新发现——尘封69年、出自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面世》,《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2期。